

文学与新闻 传播研究

第二辑

● 傅承洲 白薇 主编

WENXUE YU
XINWEN
CHUANBO YANJIU

 民族出版社

文学与新闻传播研究

第二辑

傅承洲 白薇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新闻传播研究. 第2辑/傅承洲, 白薇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4

ISBN 7-105-07658-5

I. 文... II. ①傅... ②白...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②新闻学: 传播学—文集

IV. ①I0-53②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794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 360 千字

印数: 0001 - 1000 册 定价: 2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内容提要

本书为论文集，共收录专业论文三十余篇，涉及文字学、语言学、新闻学、广告学、教育管理等多学科，对文学与新闻传播领域中诸多学术问题及现代社会中影响广泛、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了考证、研究和较为深入的探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本书作者均为在校教师，无论从研究角度还是理论观点都颇见功底，对于教学与科研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目 录

文学研究

- 论刘勰《文心雕龙》与《诗经》之关系 陈允锋 1
- 杜甫诗中的议论 蓝 旭 15
- 清品李白 梁 森 28
- “选官”何如“选佛” 王秀林 41
- 论唐代士大夫出路之一
- 《易》、《诗》二经的思想基础及表现手法 刘棣民 56
- 中国古代历险记小说论纲 傅承洲 65
- 以《西游记》为中心
- 徐霞客的山水审美趣尚 曹立波 74
- 元代状元泰不华族籍考 云 锋 84
- 必须颠覆与无法颠覆的世界 白 薇 93
- 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成长主题探究
- 现代主义诗潮中的京派诗歌 刘淑玲 111
- 舍身取义的文化精神 徐文海 137
- 鲁迅与“孝”
- 革命时期的爱情 刘 震 145
- 重读早期普罗小说的“革命+恋爱”模式

中西方“城市哀歌”之比较	宋旭红 154
——以《耶利米哀歌》和《哀郢》为例	
《荷马史诗》与《江格尔》女性角色分析	王卫华 167
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的完美结合	刘淑欣 178
妈祖与波塞冬的比较研究	邢 莉 白庆侠 194

语言学研究

古代尚色文化与汉语色彩词	孙建军 203
黄季刚“字体分类”性质商榷	韩 琳 214
《十三经注疏》中《三礼》注疏句读辨误	万丽华 225
北京人言说热情的成因探索	李娴霞 234
表动作行为的词义项划分差异的类型	赵 强 245
对电子公文的几点思考	魏 彬 261

新闻学研究

论网络民意的真实性与失真性	王晓英 276
媒介视野中的农民	赵丽芳 286
论清末报律	汪 露 秦志希 294
云南省当代新闻传播事业调查报告	赵五星 313
论专栏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出现的必然性	张芝明 325
专业如何才能创造价值	刘瑾鸿 335
——浅谈电视财经节目的现状与未来	
FLASH 与电视新闻	杨晓凌 343
《华山论剑》:媒体造势与地域文化的链接	刘卫华 351
关于现代科技与电视艺术关系的再思考	吕乐平 360
——以电视剧艺术为例	

广告学研究

- 充满诡计的 USP 范小青 367
- 论广告视觉表现中的夸张手法 郭梅雨 378
- 迈步从头跃 王 斌 387
- 从“威弛”上市一周年看丰田品牌在中国市场的重塑
- 论本土企业品牌个性塑造 杨 超 397

教育管理研究

- 本科教学管理点滴 赵富芬 413
- 试论凉山彝族家支家谱教育习俗 刘正发 420

文学研究

论刘勰《文心雕龙》与《诗经》之关系

陈允锋

宗经观念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根本思想之一,这是人所共知的理论事实。但是,在刘勰所列举的儒家五大经典中,除了《周易》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受到较多的关注外,其他四部经典究竟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中具有怎样的作用,学术界似乎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在《文心雕龙》与《诗经》之关系问题上,研究者更为关注的是刘勰如何评论《诗经》,而《诗经》是如何影响《文心雕龙》的,则未遑细究。本文即以此为重点分析对象,以期较为具体而深入地说明《诗经》对刘勰文论的影响。这对我们更好地解释《文心雕龙》与前代文化传统的联系,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文心雕龙》对《诗经》成辞之使用及其对理论研究之意义

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并没有专门评论《诗经》的篇章,但是,《诗经》在《文心雕龙》整体理论建构中,又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归纳分析,而刘勰大量引用《诗经》成辞以行文达意,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是我们理解《文心雕龙》与《诗经》之间密切关系的最直接、也极具体的途径之一。以下根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将《文心雕龙》之遣辞造句与《诗经》有关者,撮要列举如次:

《原道》：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召南·采芣》：谁其尸之。）

《徵圣》：文章可见，胡宁勿思？（《小雅·四月》：胡宁忍予。
《大雅·云汉》：胡宁忍予。）

《宗经》：四则义直而不回。（《小雅·鼓钟》：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辨骚》：奋飞辞家之前。（《邶风·柏舟》：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明诗》：春秋观志，讽诵旧章。（《大雅·假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乐府》：若夫艳歌婉变，怨志迭绝。（《齐风·甫田》：婉兮变兮。）

《乐府》：呕吟垆野，金石云**眚**。（《鲁颂·垆》：在野之垆。）

《诠赋》：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大雅·既醉》：昭明有融。）

《颂赞》：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大雅·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

《祝盟》：至于商履，圣敬日跻。（《商颂·长发》：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祝盟》：后之君子，宜在殷鉴。（《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杂文》：枝辞攒映，嘈若参昴。慕颦之心，于焉只搅。（《召南·小星》：嘈彼小星，维参与昴。《小雅·白驹》：于焉逍遥。《小雅·何人斯》：只搅我心。）

《史传》：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诸子》：庄周述道以翱翔。（《郑风·清人》：河上乎翱翔。）

《论说》：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颀颀万乘之阶，抵嘘公卿之席。（《邶风·燕燕》：燕燕于飞，颀之颀之。）

《诏策》：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周颂·烈文》：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大雅·文王》：仪刑文王，

万邦作孚。)

《诏策》:君父至尊,在三罔极。(《小雅·蓺蓼》: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檄移》: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大雅·常武》:王奋厥武,如霆如怒。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檄移》“奋其武怒”条按:《左传》昭公五年:“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

《封禪》: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邶风·柏舟》: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封禪》:勒功乔岳,铸鼎荆山。(《周颂·时迈》:怀柔百神,及河乔岳。)

《章表》: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秦风·小戎》:乱我心曲。)

《奏启》: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大雅·烝民》: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大雅·民劳》:无纵诡随。)

《议对》:自两汉文明,格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大雅·卷阿》:蔼蔼王者多士。《大雅·小旻》:谋夫孔多,发言盈庭。)

《书记》:古有铁券,以坚信誓。(《卫风·氓》:信誓旦旦。)

《风骨》: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小雅·四月》:翰飞戾天。)

《情采》: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情采》: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小雅·角弓》:翩其反矣。)

《章句》: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小雅·十月之交》:黽勉从事,不敢告劳。)

《比兴》: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大雅·既醉》:昭明有融。)

《夸饰》:变彼洛神,既非罔两。(《邶风·泉水》:变彼诸姬。)

《指瑕》:斯言之玷,实深白圭。(《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养气》:逍遥以针劳。(《郑风·清人》:河上乎逍遥。)

《附会》:是以驷牡异力,而六轡如琴。(《小雅·车辖》:驷牡骅骝,六轡如琴。)

《时序》:降及怀愍,缀旒而已。(《商颂·长发》:为下国缀旒。)

《时序》: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大雅·崧高》: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大雅·生民》:实秀实发。)

《物色》:春日迟迟,秋风飒飒。(《邠风·七月》:春日迟迟。)

《知音》:阅乔岳以形培塿。(《周颂·时迈》:怀柔百神,及河乔岳。)

《序志》:乃小子之垂梦欤!(《大雅·思齐》: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从以上所列资料不难看出:《文心雕龙》对《诗经》成辞的沿用,遍及“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等部分;其语言取材于《诗经》者,则涵盖了风、雅、颂。这些例子除了有助于我们了解《诗经》对刘勰《文心雕龙》写作的实际作用,还能够为我们研究《文心雕龙》的相关理论提供有力而直接的证据。

比如,关于《文心雕龙》中的宗经思想,不少论者认为刘勰乃侧重其“为文之用心”,即文章写作基本原则、创作技巧以及文辞的运用等方面。这种认识虽然未必很全面,但确实揭示了刘勰宗经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文心雕龙》对《诗经》成辞的广泛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文心雕龙·宗经》篇与《事类》篇的有机联系:《宗经》篇在讲到儒家五经的巨大功用时说:“若稟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该篇赞语又说五经乃“文章奥府”、“群言之祖”。从《宗经》篇所提出的“体有六义”的内涵看,也涉及儒家五经之语言对后代文章写作的典范意义;《事类》篇则以《宗经》篇为理论基础,就一个具体的写作技法论及同样的问题:“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并且认为:“经典沈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

之神皋也。”又说：“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篇如江海，郁若昆邓。”因此，在刘勰看来，后人学习、效仿经典，一方面要从辞采、立意等层面着眼，另一方面则要遵循“经籍之通矩”，即准确地使用“事类”，达到“用人若己，古来无懵”的高境界。应当说，刘勰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在《文心雕龙》写作中得到了成功的实践。《文心雕龙》对《诗经》成辞的灵活运用，与刘勰本人所理解的“经籍之通矩”合若符契。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事类》中指出：《文心雕龙》之辞采，“仍染时尚，未脱骈文窠臼，惟‘奇’字较多，颇见新风，故暗引成辞，所在多有”。^①可见，刘勰提出“用人若己”的用典标准，并非理论家之空言，而是切合实际，且能身体力行，故《文心雕龙》虽为骈体，典故繁多，但行文贯畅、一气流转。

又如，刘勰的文论有重天赋才情的倾向，但并不否定后天之“学”的重要性。《神思》篇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又说：“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并认为“博见为馈贫之粮”、“博而能一，亦有助于心力矣”。这与《体性》篇“功以学成，才力居中”；《事类》篇“文章由学，能在天资”等观念，是前后贯穿一致的。从前文所引《事类》篇有关材料可以看出，学习儒家五经，正是后代文章作者“积学储宝”最为重要的途径，《风骨》篇就说：“若夫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选言之途很多，包括“翔集子史”，但“镕铸经典”仍然居于首要之地位。《文心雕龙》对《诗经》成辞的熟练使用，说明刘勰的宗经理论、“积学储宝”之主张，对成功的文章写作来说，确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对《序志》篇中一段论述进行新的阐释，文中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刘勰从“文体解散”、“言贵浮诡”等角度批评后代作者对五经之“本”的疏远偏离，目的是为了强

^① 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466～467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调“贵乎体要”的写作大法,但也反映出刘勰对后天之“学”的重视,因为“去圣久远”所形成的弊端之一,就是作者之“学”的贫乏。魏晋以来文学自觉思潮的重要表现之一,应当说是尚才情,刘勰之重“才”,以为“能在天资”,与时代潮流相一致,但其理论之所以能超越时代局限而提出许多迄今仍有启迪意义的观点,跟他尚“才”而不囿于“才”的圆通思维有密切关系,重“博学”就是一个方面的体现。《才略》篇评论两汉文学时说:“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又说:“子云属意,辞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马融鸿儒,思治识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潘勖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可见,在“引书以助文”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有像扬雄、马融、张衡、潘勖这样的杰出作家,他们的成功,“博学”是重要因素之一,这自然与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密切相关。《文心雕龙》对《诗经》成辞的大量使用,同刘勰本人重博学的观点以及具体评论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显然也是相一致的。

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如何将理论内涵的阐释与具体的创作实际联系起来,应当说迄今仍是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以上着重以《文心雕龙》援引《诗经》成辞为依据,简略地说明了刘勰的有关思想,将刘勰《文心雕龙》的写作实践同他本人的理论相印证,将文本研究中的注释成果与理论阐释相结合,也算是对提倡《文心雕龙》理论研究与创作实际相结合之主张的一种尝试。

二、《文心雕龙》对《诗经》中有关思想观念的继承

刘勰《文心雕龙》与《诗经》之关系,自然不仅局限于沿用成辞一端。他对《诗经》成辞的化用,有时还涉及重要思想观念的继承问题。我们在考察刘勰文学思想的历史渊源时,似乎应当顾及《诗经》的影响。比如,《文心雕龙·通变》篇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斟酌乎质文之间,櫟括乎雅俗之际。”刘勰是崇尚典雅文风的,但并不一味否定文辞之俗,所以《体性》篇论风格问题时,又列有以“浮文弱植,

缥缈附俗”为特征的“轻靡”一体,“论文叙笔”部分也对杂文、谐谑等俗文体进行了归纳总结;《书记》篇则更为集中而具体地表现了这一思想:“谚者,直语也。……《牧誓》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并上古遗谚,诗书所引者也。……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逾于此,岂可忽哉!”刘勰之所谓“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酌情采用民间俗语。《书记》篇据以立论的例证之一,正是《诗经》之成句。又,《议对》篇说:“三代所兴,询及刍蕘。”其中“询及刍蕘”一语,原见《诗经·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蕘。”对于“刍蕘”之言的重视,本是《诗经》的重要特点之一,刘勰受宗经思想制约,自然也继承了这一观念。凡此均可说明,刘勰之能明确提出“櫟括乎雅俗之际”的主张,跟他“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的认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诗经》则是刘勰崇“雅”但不废“俗”观点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又如,强调通变、讲求创新,是《文心雕龙》的一大理论宗旨,《通变》篇就专门论述这一问题。关于刘勰“通变”观的思想来源,很多学者都认为与《周易》,尤其是《易传》有直接继承关系。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如果我们将研究视野拓宽一些,更仔细地研读《文心雕龙》的文本,就不难发现:刘勰之重通变,《诗经》也是重要的思想观念背景之一。《诗经·大雅·文王》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维新”思想重在变革求新,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政治哲学观念,对后代影响极为深远。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文心雕龙》屡次援引“维新”之说,如:

《史传》:自周命维新,姬公定法。

《封禅》: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固维新之作也。

《奏启》: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

《时序》:武帝惟新,承平受命。

在以上四个用例中,《史传》、《时序》二例之“维(惟)新”涵义,与《大雅·文王》相一致,但《封禅》、《奏启》之用“维(惟)新”,则具有明显的文学批评意味:一者说司马相如于两汉封禅之文有首创之功,且文采华茂,故称之“维新之作”;二则说西晋以后,“奏”体的应用范围日益宽广,故曰“惟新日用”,总之,此二例之“维(惟)新”,都涉及文学发展史问题。其立论基础,自然是刘勰的通变观;其思想渊源,则显然跟《诗经》关系更为密切。

《文心雕龙·程器》篇说:“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刘勰引《尚书》为证,强调“器用”与“文采”之不可或缺,所以,他又说:“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弼中,散采以彪外,……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这种观念,与《徵圣》篇提出的“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以及“修身贵文”思想,正是前呼而后应。在刘勰看来,儒家经典之可贵,就因其“器用”与“文采”并重,“义固为经,文亦足师”(《才略》),是作者内在之“德”与外在之“文”完美结合的典范。这种文学观念,自然有对刘勰所尊崇的孔子“文质彬彬”理想的继承,但如果更进一步考察这一观念在《文心雕龙》中的具体表现,却也不能排除《诗经》对刘勰的影响。最显著的例子是《章表》篇,刘勰说:“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国华”就“德”言,“身文”就“文彩”言,二者相互统一,总体思想跟《徵圣》、《程器》是一致的,故《章表》篇赞曰:“君子秉文,辞令有斐。”这两句用来总结全篇要旨的赞语,就是对《诗经·卫风·淇澳》“有匪君子”的化用。又,《情采》篇说:“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摘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这里的“彬彬君子”乃采用《论语》之成说,而“雕琢其章”则为《诗经》之成句,《大雅·棫朴》曰:“追琢其章。”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谓:“‘追’与‘雕’双声假借。《说苑·修文》征引,‘追’即作‘雕’。”与此相似的例证,又见《时序》篇:“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構。”刘勰用以赞美刘宋文帝之“彬雅”的“秉文之德”,也是借用《诗

经》之成句,《周颂·清庙》曰:“秉文之德。”宋文帝于朝廷立儒学、玄学、史学及文学,儒、文并重,正符合“文质彬彬”的标准,刘勰以“秉文之德”喻之,良非虚美。此外,《辨骚》篇评屈原《离骚》说:“金相玉式,艳溢缛毫。”按,王逸《楚辞章句序》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刘勰显然沿用了王逸的评论,但“金相玉式”之说,从根源上讲,则来自《诗经》,《大雅·棫朴》曰:“金玉其相。”刘勰加以借用,目的也是为了说明《离骚》既有美好之内质,又有华丽之外采,所以,《书记》篇再用之:“既驰金相,亦运木讷。”《诗经》之“金玉其相”,本可兼指内质与外表,刘勰也正是在“衔华而佩实”这个层面来运用此一成辞及其所蕴涵的思想意义。与此有关的,还有《声律》篇,注重文章的声律美,是刘勰尚文思想的具体表现,他在表达这一审美理想时,实际上也化用了《诗经》之观念。《郑风·有女同车》曰:“佩玉将将。”毛传:“将将,鸣玉而后行。”又《卫风·竹竿》曰:“佩玉之傒。”毛传:“傒,行有节度。”而《文心雕龙·声律》篇则说:“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丽辞》篇又说要“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也与音律节奏之美有关,其观念之来源,都跟《诗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心雕龙》之论“诗”,从政治功用的角度看,与汉儒相一致,即美刺并重,故《明诗》篇追溯诗歌传统时指出:“顺美匡恶,其来久矣。”应当重点一提的是,《诗经》中表现出来的重讽怨的创作思想,对刘勰的文学观念有深刻的影响。《辨骚》篇说《离骚》同于《诗经》者四:典故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后三点都与怨刺精神有关,《明诗》篇评《离骚》,则一言以蔽之,曰:“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这种怨刺传统,有的学者认为仅仅是汉儒的主观臆造,事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诗经》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想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讽怨,其典型者如《魏风·葛屦》:“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又如《陈风·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再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讟”,等等。对于这种文学传统,刘勰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情采》篇谓:“昔诗人什篇,为

情而造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即刘勰论《诗经》“六义”之“兴”，与汉儒并不完全一致：毛传说“兴”，义兼美刺；郑笺释“兴”，则偏重于“美”；刘勰不同，直接将“诗人”之“兴”跟“志思蓄愤”的讽怨传统联系起来。《文心雕龙·比兴》篇也体现了这一理论倾向，故曰：“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①很显然，刘勰把怨刺精神看成《诗经》之“兴”的本质特征，故以“道”视之。刘勰之释“兴”，跟钟嵘也不同，因为《诗品序》中说，所谓“兴”，乃“文已尽而意有余”者也。从刘勰关于“兴”的独特理解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与《诗经》中讽怨传统的内在联系。为进一步申明此一层关系，不妨再举两例以证之：一者见《文心雕龙·奏启》篇：“《诗》刺谗人，投畀豺虎”；二者见《书记》篇：“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

除了以上所论列的问题外，《文心雕龙》与《诗经》思想观念的关联，还有不少值得探讨的论题，如《文心雕龙·才略》篇谓：“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缙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又如以《风骨》篇为代表、以“风”品论诗文的审美特质，都很容易使我们想到《诗经》中的有关思想，前者如《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以及《小雅·日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后者如《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以及《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②等等。综合这些资料，同样可以了解《诗经》中的文学思想对于刘勰《文心雕龙》的重要意义。至于《文心雕龙》之《情采》、《夸饰》、《比兴》、《时序》，以及《物色》等篇章中重要文学观点的提出，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更是显而易见。限于篇幅，兹不赘论。

① “诗刺道丧”之“诗刺”二字，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谭献说：“疑当作讽刺。”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谓：“按训故本正作‘讽’。当据改。”但即便将“诗刺”改为“讽刺”，其义仍就《诗经》而言。

② 《诗经》中的这两首作品，都与吉甫有关，而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也提到他：“商周之世，则仲虺垂诰，伊尹敷训，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足师矣。”